

漂洋过海：林偕春与新加坡的 林太师信仰

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叶欣颖

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

内容摘要：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早期的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因此，新加坡早期的民间信仰，亦是随着移民传入，逐渐发展壮大成今天的规模。新加坡华人的民间信仰中，以妈祖、关帝、大伯公等最为普遍，而历史悠久的云山宫林太师信仰，则一般人较为陌生。云霄林太师庙大概是最早奉祀林太师的庙宇，建于清朝光绪九年（1883），之后在台湾基隆、南投和新马等地都有分庙，并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本文主要探讨林太师信仰的由来及其在东南亚的传播，并尝试分析林太师如何从明朝的文官成为当地人所奉祀的神明；源自云霄的地方信仰又如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通过街道的命名而得以肯定其在地的地位。

关键词：

林偕春、林太师、云山宫、福建云霄、新加坡

一、知人论世：林偕春

林太师，本名林偕春，字孚元，号警庸，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晚年自号云山居士，祖籍福建云霄。¹林偕春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登进士²，隆庆二年（1568）“分校礼闱”，担任翰林院检讨，从事《明穆宗实录》纂修工作³，书成授史职编修⁴，又以侍读学士为太子太傅，并出任两浙学政等职位。⁵虽然林偕春在正史中并没有传记，但地方文献中根据林偕春的墓志铭等史料而编撰的林太师公传颇为详细，对林偕春的生平与事迹有深入的记载。其中，何乔远撰写的《八闽英旧传》最为完整，《漳浦县志》和《云霄厅志》均“承用此传，不易一字”。⁶

¹ 黄凤翔：《明亚中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参政前翰林院编修警庸林公墓志铭》，见林偕春：《云山居士集》，云霄：修复云山书院林太史墓董事会，1986，第3-7页。

² 陈汝咸修、林登虎纂：《福建省漳浦县志》卷十二（民国十七年翻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818页。

³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穆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第3页。

⁴ 黄凤翔：《明亚中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参政前翰林院编修警庸林公墓志铭》，见林偕春：《云山居士集》，云霄：修复云山书院林太史墓董事会，1986，第4页。

⁵ 黄凤翔：《明亚中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参政前翰林院编修警庸林公墓志铭》，见林偕春：《云山居士集》，云霄：修复云山书院林太史墓董事会，1986，第3-7页。

⁶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序，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1-13页。



林偕春画像



清刊本《云山居士集》

林偕春一生著述甚富，逝世后其弟林弘春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搜诸荒管所遗”，“参与传儿所抄，副平日所诵记，前后凑集，详加检阅，文以汇而集，集以时而次，编辑成书，厘为八卷”，编印了《云山居士集》流传于世。但今天流传于世的《云山居士集》并非万历年间版本。据《云山居士集》眷印前言所载，万历版后来散佚，云霄云山书院在清朝光绪九年（1883）从民间搜集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版残本，重刻《云山居士集》五卷流传。1985年，云山书院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修复云山书院林太师墓董事会在民间访得刻本全集，并于1986年重刊，文集才得以流传至今。⁷

⁷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序，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页。

《云山居士集》充分反映林偕春赤诚济世、胸怀大志的思想性格。例如他通过《孔明论》谈论君臣关系，并借古喻今，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文中他对诸葛孔明的赞扬和赏识，表达了林偕春心中无法施展的抱负，以及对忠诚致君的重视。⁸ 世宗嘉靖一朝，因为早期的大礼议事件，使君臣关系甚为紧张，以至影响正常的政治运作。林偕春通过历史人物孔明来谈君臣关系，亦可谓有感而发。虽然林偕春一生中有许多抱负无法实现，但他依然尽心尽力地为地方上的百姓争取减轻税赋，改善民生。《代乡人呈罢榷税启》中，林偕春指出：

计所榷者皆鱼、盐、薪、布等物，在官无秋毫之利，在民有剥肤之灾。即使内监闻之，亦且酸鼻不忍，登时报罢矣。⁹

出于对百姓的怜悯之心，文中也描述百姓生活的困苦，以及征税对百姓所造成的压力，并恳请各衙门能够停止榷税的征收，以减轻百姓的负担。¹⁰由此可见，林偕春是个处处为

⁸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二，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29-30页。

⁹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四，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12页。

¹⁰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四，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11-113页。

民着想的文人，深受百姓的爱戴。此外，不管是林偕春的墓志铭还是后人为他写的传记，都会提到他曾因“王言有体”，不愿加以修饰而得罪权相张居正，反映林偕春刚正不阿的思想与高尚的品德。林偕春在《回习豫南书》中提到“士各有志，贵能自适，若其苟徇，即为舍己”以及“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又安能贬胸中之奇崛，徇他人面目之欢”¹¹，表现出林偕春的清高和不向权势低头的精神。

《云山居士集》中收录了不少林偕春对当时的政治和时事课题看法的奏议。例如，在《治漕河议》中，林偕春谈到治好漕河的重要性，他认为：

大抵漕河之水所以常为患者，病在身狭而口隘，身狭则水易侵岸，口隘则水不直泻。故当秋水泛滥之时，而其所冲射啮蚀者益甚，甚则沙土浑流，茫茫不可测。¹²

奏议中林偕春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并从根本去解决问题。明朝的财政赋役制度，以漕运最为关键。《明书·漕河志》载：“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

¹¹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四，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70-72页。

¹²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4页。

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¹³足见漕运对国家的经济与民生的重要性。因此，《治漕河议》反映了林偕春对时事与民生的关心，希望当局能够有效地处理漕河泛滥的问题。除了谈及漕河泛滥的主要原因，林偕春也在文中引用唐尧之世的事例：

古今称水患之最巨者，莫如唐尧之世。唐尧以九年滔天之水，一旦举而俾乂于禹，为禹者亦不以为难而辞之也。¹⁴

在此，林偕春仿佛在借古喻今，借曾经发生过水患的唐尧之世与当时明朝的漕河之患作对比。他在后文中也通过赞扬禹的忠诚与智慧，感慨明朝没有像禹这样的官员，为国家效力。林偕春的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见证了当时官场与政治的腐败。因此，漕河之事当然也成了他抒发对晚明政治的失望。

其次，林偕春对于当时国家的军事与治安方面，也有他的见解。通过《防边议》、《安攘要务论》、《邑志兵防论》等奏议，他谈到守边之道。《防边议》中，林偕春提出：

¹³ 《明书》卷六九，《河漕志》一，见韦庆远编：《张居正和明代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735页。

¹⁴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4页。

今国家定鼎幽燕，与北狄密迹，边防重镇，匪同守边，实以守国也。万一防御不支，则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故防边之策，在今日尤为要急。¹⁵

由此可见，林偕春非常重视国泰民安，强调制定有效的防御政策是当务之急，守边之事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他在文中说明防御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任将、保众、实屯、敕法和恤士等“五议”。¹⁶这五议主要围绕军中除了要有好的将领来领导，也要能够掌握民心与军心。在林偕春的文章中，这仿佛是个不断重复的主题。结合其他与军事相关的文章来看，林偕春总是站在士兵与百姓的立场来看待问题，不断地强调官吏要爱民如子，将领要体恤下属。他在《兵食论》中提到：

处国家全盛之时，而使人恒抱乎不终日之虑，其弊不在于无兵，而在于无食；其弊不在于无食，而在于所以足食者或非其道也。¹⁷

在这篇文章中，林偕春以兵食不足为出发点，进一步探讨国家的管理问题，全文的意旨在于弥补现有的缺失，而解决问

¹⁵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7页。

¹⁶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一，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17-21页。

¹⁷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二，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30-32页。

题的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¹⁸

二、声名显赫：从太史到太师

林偕春的思想性格和在地方上的贡献与他被当地人神格化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西方社会学家杨庆堃便指出，民间信仰是一种“泛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其特色是一个族群的宗教信仰没有系统的教义，也没有历史悠久的经典和严格的教会组织，而信仰的内容经常与一般日常生活混合。¹⁹因此，林偕春的地位从历史人物转变为地方的神明，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当地的贡献有密切关系。由于林偕春在生时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即使去世后没有留下宗教性的教义、经典或组织，当地民众还是相信一生体恤民生的太史公能保佑他们国泰民安，阖家安康，金榜题名，成为地方百姓的心灵寄托。

虽然没有文献明确地指出林偕春是何时开始成为民间信仰，但我们可以通过地方志等材料来进行推测。据《云霄县志》建置所载，云霄县在嘉靖元年（1796）分属漳浦、

¹⁸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卷二，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第30-32页。

¹⁹ 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页。

平和、诏安三县，并在民国二年才正式改厅为县。²⁰因此，漳浦和平和的县志也都记载关于林偕春的事迹，把林偕春称为“本县人”，而这份认同感在追溯林太师信仰的由来至关重要。《福建省漳浦县志》修于清朝康熙三十九年（1700）²¹，而《福建省平和县志》修于清朝康熙五十八年（1719）²²。在这两本县志当中，有关林偕春的资料主要出现在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及杂览，而《漳浦县志》还收录了林偕春所作的〈万历县志引〉。²³由此可见，截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林偕春在地方史上的地位依然是明朝的文人，还没有被当地人供奉为神。

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编修的《福建省云霄县志》的凡例所载，此县志是根据漳浦、平和、诏安三本县志的内容，“以国史为依据”重新编修。²⁴这对研究林太师信仰的由来可说是相当完整的史料。此县志非常详细地记录许多有关林偕春的事迹。从地理（疆域）到典礼、政治、选举、艺

²⁰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卷二（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第48页。

²¹ 陈汝咸修、林登虎纂：《福建省漳浦县志》（民国十七年翻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封面。

²² 李鋹、王柏等修、昌天锦等纂：《福建省平和县志》（光绪十五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封面。

²³ 陈汝咸修、林登虎纂：《福建省漳浦县志》序（民国十七年翻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17-21页。

²⁴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凡例（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第17-20页。

文、列传（宦绩）与丛谈，都提及林偕春，提供了多方面的史料。²⁵其中，卷五——〈典礼〉（祠祀附）记载：

太史庙在竹仔街，祀明太史林偕春先生。先生文章气节，当然没可祭社，但地方人士，应为合理之崇拜，始无损先生之身份。今一般民众，误太史为太师，已大不合，况庙内设筴，置签，几与普通淫祀无异。崇拜欤？侮辱欤？知礼之君子，当有以辨之。²⁶

县志中所描述的太史庙应该指的就是云山书院。²⁷〈典礼〉（祠祀附）一节概述了两个现象：其一，早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就已经有人开始质疑称林偕春为“太师”的说法，指当地的百姓误称林太史为太师。据《明史·职官志》所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无定员，无专授。……嘉靖二年加杨廷和太傅，辞不受。其后文臣得加三公，惟张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并从一品，掌以道德辅导太子，而谨护翼之。……惟永乐间，成祖幸北

²⁵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²⁶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卷五（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第149页。

²⁷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卷十一（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第330页。

京，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少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世皆为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²⁸由此可见，太师和太子太师的官职是分开的，官位的品级也不同。既然太子太师的职衔在明代永乐之后都只是虚衔，而林偕春的墓志铭里也没有提及此职衔，林偕春应该没有担任过太子太师。同时，对于太师正一品的职衔，以上文献记载自嘉靖二年后，只有张居正于万历年间获三公之衔。因此，经此考证，我们可以说林偕春在明朝的时候曾担任史官，所以一般称之为“太史”。至于“太师”名称的由来，一方面或许是信仰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由于读音相近而混淆，无意中提高了林偕春的地位，并流传于世。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人们有意识地把历史人物神格化，因受人民的祭祀而成为神，由地方上的百姓提高林偕春的身份地位。然而，不管是误传还是神化的尊称，林偕春在地方上的贡献及广受人民的爱戴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在民国时期，奉祀林太史似乎不受地方政府的认可。从县志的编纂而言，典礼志一般是记录地方上的宗教制度，不明确指林太史的祭祀为一种信仰。然而，从编者的描述中可见，林太史的祭祀在地方上似乎已逐渐成为民间信

²⁸ 张廷玉：《明史》（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731-1732页。

仰，有笙杯、求签，似乎类似迷信之举。编者在描述太史庙的时候针对民间的祭祀活动所提出的问题，明显在质疑当地人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意祭祀林太史是对历史人物的贡献与身份的表扬，但是基本上对林太史成为民间信仰还是有所保留。同时，县志之后在〈政治（保安）志〉中也再次反映民国时期政府对太史庙的立场，在“抵制迷信”下记载：

本县地居滨海，民风闭塞，民国三十五年冬，云山书院降乱酬神演戏，敛钱，哄动远近，徐县长炳文，杨局长凤城，鉴于民生凋敝，更届冬防密途，恐伏匪因而生心，为预杜乱萌计，遂毅然下令禁止。按当局是举唤醒□梦，绥靖地方，盖一举而数善备焉。²⁹

由此可见，国家与民间对林太史的看法是有所出入的。从官方的立场，林偕春只是位历史人物，是云霄县的人把他的地位抬高，并且把他神格化。但是，由于林偕春在历史上对云霄县有所贡献，地方上的人因此认为崇拜他是合理的行为。即使云山书院的活动曾经在民国时期的“抵制迷信”下被禁止，民间对林太师的崇拜与祭祀却似乎没有中断，甚至流传至今。这也反映林偕春从历史人物到民间信仰中神明的转

²⁹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卷十二（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第365-366页。

变，成为一种以祖先崇拜、社区神明崇拜为代表的泛化宗教。³⁰

同时，据《云霄风物志》所载，云山书院是“清朝光绪九年（1883）邑人为追念林偕春的德泽”而兴建的，俗称“太师公庙”。³¹随着时代的发展，此庙也逐渐成为“祖庙”，分香至海外，让这份民间信仰得以流传。因此，虽然无法明确说明林偕春是什么时候成为地方神明，但是此信仰最早能追溯至1883年，太史公成为云霄县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信仰迁移：从云霄到新加坡

信仰的南来与移民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些庙宇，如妈祖庙，是由移民一上岸就设立的。但有些却过了一段时间才建庙，主要看信徒的经济能力。但即使他们没有马上设庙供奉，对于家乡神明或祖先的信仰在他们之间依然存在。³²林太师信仰是属于后者，是林氏宗族在南来后逐渐建立起地方网络后才将此信仰发展开来的。

³⁰ 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页。

³¹ 方群达、李建生：《云霄风物志》，香港：香港飞翔国际出版社，2006，第106页。

³² 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第223页。

新加坡供奉林偕春的云山宫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先贤林崇德领导乡民筹建，从云霄县把林太师公分香请到新加坡。由于林偕春晚年自号“云山居士”，其庙便取名为“云山宫”，可说是移民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后便把林太师信仰从云霄云山书院分香至此。对于信仰的“分香”，厦门大学曾玲曾经指出：

伴随闽粤移民而“南移”东南亚的祖籍神明，也经历了一个“分香”的过程。不过，中国海外“移神”的“分香”呈现出空间上的“跨境”特征，这直接影响和制约中国海外“移神”的方式、过程与功能。³³

的确，文化与信仰往往会随着移民迁移至新的地方，但在迁移的过程中会随着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而改变。林太师信仰也不例外，在分香至新加坡后也逐渐融入一些地方色彩，在新的土地上发展开来。

首先，林太师信仰分香至此的其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庙宇背后的人群与网络——奉祀林太师的人开始超越原有的宗族组织。作为云霄的民间信仰，林太师信仰是建立在原籍地或宗族的基础上，因此把信仰从云霄带过来的人应该是云

³³ 曾玲：《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见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第120页。

霄人（地缘组织）或姓林的后代（血缘组织）。地缘的定义很广，严格说是指云霄县的人，但广义上也可以指来自漳州其他县的福建人。因此，对于一个移民社会，虽然把祖先带过来祭祖的可能性较大，但地缘和血缘的宗族组织往往会相互重叠，联合起来重新在新的地方建立起家乡的信仰。据新加坡云山宫的其中光绪廿八年（1902）题邱炜尧所撰《新建禡山溪云山宫记》，记载林崇德对建立云山宫的贡献：

迨岁辛丑林君崇德同人等…先献宫地一區，复为募捐于各坡士商者，鳩工龙材，肇创夏季，遂于是冬竣事，乃卜吉举行落成之礼。越明年壬寅，而使林君采达以庙记属余。³⁴

我们无法掌握有关林崇德的资料，但是从以上的碑文可以推测出他在禡山溪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力，既能号召村民捐钱建庙，又能请人找当时的著名文人邱菽园为此庙写碑记。另从当时云山宫董事会的成员去看，虽然庙宇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宗族的特色，由林氏宗族的人在董事会中只占三分之一，这也显示了林太师信仰在来到新加坡后，宗族的特色逐渐淡化，发展成新加坡华人的信仰。这个现象与当时甘榜中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³⁴ 《新建禡山溪云山宫记》，光绪廿八年（1902），见云山宫：《云山宫林府太师——新宫落成盛典纪念特刊》，新加坡：云山宫，2011，第34页。

云山宫坐落于武吉知马区的祆山溪，后改为万山溪。据黄泉发先生的口述历史记载，早期（约三、四十年代）³⁵，万山溪一带是马来甘榜，马来人对比华人的比数是三比一，而当时的华人来自中国的不同地方，没有固定的一个祖籍或姓氏聚集在此地。³⁶若因此推算至1902年建庙的时期，无论是地缘还是血缘宗族组织，都需要结合当时华社的力量才能够在一个以马来人为主的地方立庙。

虽然林太师信仰在一开始来到新加坡不是作为林氏宗族的“开基祖先”，但是却承载着福建移民对祖籍的地方神明、对祖先的崇拜。然而，当信仰逐渐扩散至新加坡华人社群的信仰时，云山宫与林太师信仰便成了新加坡华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尤其是曾经居住在这个甘榜的人。由于信仰往往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其功能会随着时代、地方与个人的需要而改变，其中就包括神明的“职责”与保佑的对象。

林太师信仰在新加坡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云霄人把他神格化时所赋予他的神力，主要还是祈求平安，保佑村

³⁵ 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录音于1988年，当时黄先生61岁，因此，他所回忆的童年时期应该指30-40年代（祆山溪已改成为万山溪）的事。

³⁶ Ng, C. H. (1988, November 22). An oral history with 黄泉发 Ng Chuan Hua/ Interviewer: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Retriev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973, Reel/Disc 1 of 5, 20:22-21:09.

民能够安居乐业，所关注的依然是与民生有关的事务。³⁷同时，当时任何人、不分籍贯，都可以拜祀林太师，除了凡事都很准确之外，林太师公在医治疾病方面也非常灵验。³⁸这除了显示神明所保佑的对象之转变，也反映林太师作为地方神明的“职责”也开始有了转变。若比较上述的“神效”，林太师保平安、保丰收似乎比治病更符合他在云霄时的“职责”。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医药尚未发达的年代，许多人只能通过信仰来寻求精神上的慰寄，而林太师信仰也因此多了地方色彩。



林太师神像



新加坡云山宫

³⁷ Yap, S. C. (2015). *An Extraordinary Ordinary Story - The Stories of Our Pioneers*. Singapore: Pagesetters Services Pte Ltd, 30.

³⁸ Ng, C. H. (1988, November 22). An oral history with 黄泉发 Ng Chuan Hua/ Interviewer: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Retriev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973, Reel/Disc 3 of 5, 29:19-30:15.

结论

云山宫自1902年建庙以来，见证了从英殖民地时期，到马来亚时期，再到新加坡独立后的历史。目前云山宫位于29 Jalan Lim Tai See（林太师路29号），靠近武吉知马区的第六道一带，属新加坡的高尚住宅区。云山宫旁边也有一条名为“林太师径”（Lim Tai See Walk）的小路。这两条街道都是以林太师的名字命名，以中国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街道的现象，在新加坡相当罕见，加上云山宫在2009年成为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受保留建筑物文化遗产之一，更显得特殊和具有研究价值。



新加坡林太师路



云山宫的酬神戏

Jalan Lim Tai See（惹兰林太师）指的是云山宫前面的地段，前身为“万山溪”³⁹，建庙时称“禡山溪”⁴⁰。虽然改“禡山溪”为“万山溪”的年代与原因不明，但万山溪是早期这一带甘榜的名字，而云山宫可算是这一带的村庙，于是这条路后来也随之称为“万山溪”。据曾经居住在这一带的黄泉发先生所言，这里早期没有正式的道路，因此万山溪这一带曾经属于“Coronation Road”，而现在的“惹兰林太师”是后来政府在重新规划这个地段时才划分出来的街道。⁴¹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追溯庙前的这条街正式改为“惹兰林太师”的具体年份，但是从1957年至1970年的报章记录看来，有关这个街名的记录已经开始模糊，有“万山溪”、“Kampong Lim Tai See”和“Jalan Lim Tai See”三种说法参杂使用。

从现有的材料看来，当初沿用林太师的名字作为街名有两个可能性。其一，云山宫的香火鼎盛，长期以来是这一带的地标。据地理学者 Victor Savage 和 Brenda Yeoh 的说法：

³⁹ 《武吉知马林万山溪云山宫太师诞辰》，《南洋商报》，1938.10.27，第9页。

⁴⁰ 《新建禡山溪云山宫记》，光绪廿八年（1902），见云山宫《云山宫林府太师——新宫落成盛典纪念特刊》，新加坡：云山宫，2011，第35页。

⁴¹ Ng, C. H. (1988, November 22). An oral history with 黄泉发 Ng Chuan Hua/ Interviewer: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Retriev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973, Reel/Disc 1 of 5, 04:50-08:16.

In both form and substance, street-names in Singapore are inspired by a wide variety of different influences, sometimes drawing on the cultural ballast of a particular community, other times responding to practical exigencies (such as the specific material form of the landscape dictating the street-name or if the street was part of a cluster of street-names sharing a particular theme), while at times conforming to a particular nomenclatural policy prevailing at the time.⁴²

由此可见，新加坡街道的命名方式相当多元化，有时保留了某个族群的文化，有时以地标命名。“惹兰林太师”便是两者的结合，既是信徒与林氏宗族的文化标志，也是这个地段的地标。对于为什么当局用“林太师”而不用“云山宫”，这是因为早期万山溪的村民都普遍称此庙为“太师公庙”。同时，由于当时甘榜还没有正式的马路，居住在万山溪或庙宇附近的居民都会以“太师公庙”作为地标。⁴³随着新加坡的甘榜逐渐发展成城市，重新划分街道也成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当局在考虑如何命名庙前的这条街时，很有可能

⁴² Savage, V. R. & Yeoh, B. S.A. (2004).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9.

⁴³ Ng, C. H. (1988, November 22). An oral history with 黄泉发 Ng Chuan Hua/ Interviewer: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Retriev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973, Reel/Disc 2 of 5, 00:55-02:06.

根据万山溪的人对庙宇的称法而命名街道，而不一定是根据中国历史人物或信仰来命名。从街名分析的角度而言，“惹兰林太师”即反映了新加坡街名与文化的多元性，也显示云山宫在武吉知马一带的地位。

其二，从林氏宗族的角度而言，以林太史命名庙前的街道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当这一带经过重新发展和规划而需要给庙前这条街取名时，或许云山宫的理事或土地拥有着有权提议将庙前的路以庙的主神、林氏宗族的祖先命名。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认同与自豪感，尤其是在不断发展的新加坡，“惹兰林太师”能够沿用至今，对族群、信徒等都是值得引以为傲的。此外，Victor Savage 和 Brenda Yeoh 也曾提到：

Longstanding place names give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resonance to streets, buildings and areas in a society where changing landscapes seem to be the norm.⁴⁴

这说明了在不断发展的新加坡，街名除了是文化认同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见证，甚至能作为勾起回忆的工具。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地标，还是族群文化认同的象征，还是普罗

⁴⁴ Savage, V. R. & Yeoh, B. S.A. (2013). *Singapore Street Names: A Study of Toponymic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6.

大众的集体回忆，“惹兰林太师”仿佛提高了林太师信仰在新加坡的地位，成为少数以神明命名的街道。

总而言之，林太师信仰作为民间信仰，就如赵世瑜所言，是人们“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的结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林太师信仰没有宗教组织的严格系统，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新加坡，信仰的形成与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族组织与地方力量的结合。追溯林太师从人到神，再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祖神”的过程，足以见证信仰的形成与传播会随着时代改变，而这改变都会反映在庙宇背后的人群网络，以及信仰在地方上的功能。林太师在新加坡能成为本地少见的中国历史人物命名的街道，说明了信仰已逐渐演变成族群的文化标志，甚至成为保留集体文化记忆的动力。

参考书目

陈汝咸修、林登虎纂：《福建省漳浦县志》（民国十七年翻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方群达、李建生：《云霄风物志》，香港：香港飞翔国际出版社，2006。

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黄凤翔：《明亚中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参政前翰林院编修警庸林公墓志铭》，见林偕春：《云山居士集》，云霄：修复云山书院林太史墓董事会，1986。

李鉉、王柏等修、昌天锦等纂：《福建省平和县志》（光绪十五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林偕春：《云山居士集》，云霄：云山书院工作委员会，1999。

《明书》卷六九，《河漕志》一，见韦庆远编：《张居正和明代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武吉知马林万山溪云山宫太师诞辰》，《南洋商报》，1938. 10. 27。

《新建祆山溪云山宫记》，光绪廿八年（1902），见云山宫：《云山宫林府太师——新宫落成盛典纪念特刊》，新加坡：云山宫，2011。

徐炳文修、郑丰稔纂：《福建省云霄县志》卷二（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曾玲：《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见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

张廷玉：《明史》（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穆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

Ng, C. H. (1988, November 22). An oral history with 黄泉发 Ng Chuan Hua/Interviewer: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Retriev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0973, Reel/Disc.

Savage, V. R. & Yeoh, B. S.A. (2004).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Yap, S. C. (2015). *An Extraordinary Ordinary Story - The Stories of Our Pioneers*. Singapore: Pagesetters Services Pte Ltd.

Across the Seas: Lin Xiechun and the Lim Tai See Belief in Singapore

LEE Cheuk Y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YIP Xin 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Singapore is a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country, her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days was mainly formed by migrant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popular religion was introduced together with the inflow of migrants from southern part of China. Lin Xiechun, also known as Lim Tai See, was a Ming official who was widely respected by local people with the same surname in Yunxiao county, Fujian, for his loyalty and virtues. The Hoon Sam Temple that devoted to him in Singapore was built in 1902.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societal progression, its followers also expanded to include other surnames and regions. While it is exceptionally rare to have a street named after a deity of a temple, Jalan Lim Tai See holds the record of being one of the few. This paper aims to trace the formation and migration of a popular belief, and its localisation in Singapore.

Keywords

Lin Xiechun, Lim Tai See, Hoon Sam Temple, Fujian Yunxiao, Singapore